

知识女性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家庭角色分析

——以《大公报》女编辑、记者为实例

侯杰¹ 秦方²

(1.; 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本文以《大公报》中的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实例, 探讨女性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如何走出传统大家庭, 接受新式教育, 步入社会, 成为职业女性, 及各自婚姻家庭的实际状况, 并对其家庭角色做类型分析, 进一步解读在近代社会转型中, 知识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和所扮演的家庭角色。

关键词: 近代社会; 家庭角色; 《大公报》; 女性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在近代社会转型中, 很多女性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挣脱传统家庭的束缚, 进入社会, 选择不同的职业, 为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实现了个人的价值。同时, 她们也扮演了不同的家庭角色。本文拟以服务于《大公报》的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 如吕碧城、蒋逸霄、陈学昭、彭子冈、杨刚¹等人为实例, 探寻女性在近代社会转型中走出传统家庭, 接受或者是发展新式教育, 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以及生活道路, 独身或者通过自由恋爱, 建立小家庭的一般规律。从而透视出在近代社会转型中, 知识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及其扮演的家庭角色, 在幸与不幸之中, 肩负着社会与家庭的双重责任。

—

本文所要讨论的这几位女性, 或者是《大公报》的专职记者、编辑, 或者是驻国外特约记者、兼职撰稿人。她们的童年经历虽然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从传统家庭中走出来的新女性。因此, 有必要对传统家庭于她们的实际作用与影响进行一番探讨。

对于中国人来说, 家庭不仅仅是社会的基本细胞, 而且还成为了社会生活的重心, 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因此家庭的力量十分强大, 家庭的制度也比较稳固。我们所要讨论的这几位《大公报》的女编辑、记者和兼职撰稿人都先后出生于 1883 年到 1914 年的 30 多年中间。其间, 传统的家庭制度和家庭观念遇到了极大的挑战。然而传统的家庭制度尽管面临巨大冲击, 不断走向崩溃, 可是却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一些传统的家庭观念虽然被迫发生改变, 但是依然左右着、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由于她们都来自传统大家庭², 所以不得不受到了传统家庭的制约和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思想的影响。

彭子冈的父亲在有了两个女儿之后, 对妻子威胁说: 如果再生女孩, 他就要娶姨太太。显然, 在父亲们的思想观念里, 女孩子的出生并不是让人欢喜的事情, 因此不溺死已经算是万幸了, 而生育女孩的责任也被完完全全推到了妻子们的身上。不仅作父亲的有如此轻视女孩的思想, 而且有些同样身为女性的老祖母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杨刚的祖母就视女孩为“赔钱货”。

在传统家庭中，她们由于性别的原因而遭到极度的轻视，生存的合理性几乎受到质疑，因而受到了许多屈辱和极不公平的对待。陈学昭就曾在幼年遭到哥哥们的多重虐待，当他们“一事不如意的时候，激烈的忿怒便压抑不住，掷东西，拍桌子”。大哥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想把其当作商品一样，要随意许配给自己同事的亲戚或兄弟；而其三哥也时常以莫须有的罪名痛打她，甚至无缘无故不让她吃饭。在唯一能帮助自己的母亲瘫痪后，她深深地感受到了身为女孩的自己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凉。她尝言：“我已经感受了生之悲哀了。我从此在家庭中是一只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同时这种不自然的生活，使我不时的感觉到，我是一个寄居寄食者，这家庭——苦的和乐的——也没有我的分。”³

正因为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所以在这种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从小就对传统家庭失去那种天然的亲近感，相反倒有了一种本能的反抗意识。加上当时反抗传统家庭制度的舆论大行其道，家庭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好象“二十世纪生下来的人，差不多个个都有着改革大家庭制度的一个革命的观念”。⁴这种冲破传统家庭束缚的观念不仅为这些新女性所接受，而且被她们不断地发扬光大，并在她们后来撰写的文章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有的人甚至把反抗传统家庭对女性的压迫作为自己从事写作和开始记者生涯的原动力：“我觉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女人的痛苦是多种多样的，处境的艰难是无法形容的。我反抗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封建家庭给女人的压迫。就这样，我开始写东西，不断的写。”⁵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她们的写作思想更加丰富，文笔日渐成熟，视野也越来越宽广，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而是逐步转向了社会，但是这种对传统家庭妇女的深切同情和对新女性抗争的极力赞同，则直接导源于这种在传统家庭生活中所孕育、生成的对传统家庭乃至社会的叛逆心理。

我们也不应该彻底否认，在传统家庭中，家庭成员一方面给她们以性别压迫和歧视，另一方面也为她们提供了一些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她们都出生在传统文人或者是官宦之家，比较强调诗书传家，向往斯文，有的家庭本身就建有家塾。因此，对她们而言，家庭成为“陶冶人最初的人文环境”⁶。另外，在当时，很多年轻男性已经越来越多地接受新式教育，他们在择偶的时候，开始希望自己的配偶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些传统家庭的家长们逐步认识到：如果再继续顽固地秉承“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女儿在长大婚配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为没有接受起码的教育而跟不上急剧变化的时代潮流，乃至影响到其婚姻的缔结。因此说，就是出于“迎合主顾的爱好”和“早日打发出门”⁷这样的考虑，也必须使她们接受一定的教育，或者是染上一点“书卷气”。

陈学昭的父亲在去世的前夕，曾千叮咛万叮嘱地对她的哥哥们说：要给妹妹读书。陈学昭清楚地知道父亲的意图：“将来嫁我时只要分点书画给我，别的什么也不用给我。”⁸当然在读传统书籍的过程中，她们间或得到过哥哥们的指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她们的家庭中，由于祖辈、父辈的长期积累，藏书都比较丰富。有的家庭还建有书房，如一代才女吕碧城的父亲在家中建了一个“长恩精舍”，所藏善本、抄本图书大约有3万多册。这在客观上也为她们识字读书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陈学昭就曾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学校里读的书是有限的，书读的较多，还是在家里。”⁹

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这几位女编辑、记者从童年时代起大都开始接受了一些最基础的启蒙教育，阅读了一些被奉为传统思想文化经典的书籍，如“四书”、“五经”、《烈女传》、《女孝经》等。显然她们所接受的启蒙教育是非常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比较呆板，甚至是枯燥乏味的，“从六点钟起床，一直念到夜里十二点或凌晨一点，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歇口气。撂下饭碗又去念书……我们每天要念上十八个小时的书，中间没有休息，只有夏天才准许我们中间回家一趟，洗澡和喝绿豆粥”¹⁰。

正是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她们掌握了一定的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知识，并且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乃至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等问题开始有了一些考虑。她们甚至得到“曹

大家是我生平最反对的一个女子，在幼年时，便觉得她所做的女诫七篇，把女子束缚得简直一些自由也没有”¹¹的认知。在朦朦胧胧中，她们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

“那些为争权夺位名利而君臣相弑、父子相残、夫妻相害、兄弟相杀的事，那些尔虞我诈的社会现象，那些嫉妒、欺骗、说谎、造谣、诬陷等的卑劣行径，都给她（指陈学昭）留下很深的印象，使她从小就懂得对人生的善恶美丑要爱憎分明，做人要疾恶如仇。”¹²

除了一些常见的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书籍之外，她们还想方设法找一些遭到家长禁止接触的书籍来偷偷阅读，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如蒋逸霄所阅读的“《红楼梦》和《西厢记》是从大哥的书籍里偷出来的，其余的书都是自己在镇上的小书铺里买来。”¹³陈学昭甚至在被哥哥们百般刁难的情况下，仍要坚持读书学习，“凡是我能拿得到的书，我都拿来看，看书着了迷，甚至吃饭时也看书。每当我吃饭，旁边放一本书，我的三哥特别凶，就拿起碗来往我头上掷。有时，罚我跪一支香二支香，饿我，不让我吃饭，要我讨饶，我不讨饶，宁愿跪，常常总是婶母来劝才收场。”¹⁴虽然充满苦涩，但是启蒙教育特别是家塾教育，使得她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所领悟，并促使她们成长。

吕碧城“自幼即有才藻名，善属文，工诗画，词尤著名于世。每有词作问世，远近争相传诵”¹⁵；陈学昭“每读一篇文章，或一篇赋，一首诗，一首词，总要寻根究底，为什么那样写？有时把读到的文章、诗、词的内容和自己当时所处的周围环境，所接触到的一些事物联系起来，幼稚的心灵好象有了新的发现。”¹⁶这样，就为她们以后从事文化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和文字功底。当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记者、编辑作为自己的职业时，这种传统的家庭教育加上新式的近代化教育使得她们如虎添翼，妙笔生花。蒋逸霄是《大公报》初期三位有名的才女之一，以关注社会各阶层女性见长。1930年2月8日至11月14日，《大公报》共分59次，连载她的长篇通讯《津市职业妇女的生活》。她所调查的对象包括洗衣妇、女巫、女职员、女交际员、鼓姬、歌女、女记者等。她文笔清丽，特点突出，所撰写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杨刚的文章更是大气磅礴，充满朝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她的700多行的长诗《我站在地球中央》，“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¹⁷

二

无庸讳言，这些知识女性接受启蒙教育最初和同时代的其他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为了“能够认识几个字，记一笔日用帐，看得懂一封信，免得将来受人欺侮蒙蔽而已”¹⁸，似乎并没有太高的要求。然而却孕育了她们最初的对新思想向往和追求的愿望，因此，当所得到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她们对新知的渴求时，她们便开始寻找获得新知的途径，不断地尝试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求取新知。

吕碧城12岁时父亲逝世，叔父霸占了她们的家产，母亲遭劫掠。此后，她就投靠了在塘沽作官的舅父，“冀得较优之教育”¹⁹。1903年为研究新学，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舅父家，以脱离家庭的方式独自到天津求学，“某日，舅署中秘书方君之夫人赴津，预约与同往，探访女学。濒行，被舅氏骂阻。予忿甚，决与脱离。翌日逃登火车”²⁰。但是由于吕碧城“国学根柢已相当深厚，当年京、津间已没有她可进的学校”²¹，于是，这样一位“手散千金而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²²的女性，在英敛之等人的支持下，遂萌生自办女学之心，并撰文就女子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非常独到的意见和看法，先后刊登在《大公报》上。

吕碧城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就是由于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女子不事生业，嗷然待哺于人，一生之苦乐，胥视一人之好恶。”所以，女子教育就是要“授以实业使得自养”，“必能自养而后能自立，能自立而后能讲立身之道”。²³有鉴于此，女子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体现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精神。在德育方面，应该包括修身、

文学、哲学、历史、传记、音乐、诗歌；在智育方面，应该包括算术、理科、美术、地理、外语；在体育方面，应该包括体操等。至于德育本身也不能有男女分别和性别歧视。她的这些文字突出地把女子接受新式教育和谋求摆脱男性束缚，争取自身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一定的时代先锋的味道。

蒋凌霄为了求学，知道“要向家庭请求供给是绝对的没有希望，……便向一个知己朋友借了一百块钱，偷偷地到上海去投考”。²⁴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这些知识女性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不惜采取一些常人看来有些不太妥当的举动。

走出家门的她们，除非象吕碧城那样本身具有相当高的才学，可以在《大公报》找到一份工作，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彻底独立于自己的家庭，在遇到困难时，还不得不需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帮助。因此，在求取新知，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这几位女编辑和记者似乎也没有完全脱离原有的家庭。她们在那时还无法完全自立，所以不得不接受家庭对她们们的资助。

蒋凌霄在进入无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后，每年需要的几十块钱零用，都是由她的母亲为她私下筹措的，因为父亲不太主张女孩子读书。后来，她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求学，其母依然为她私下筹划费用，并按时邮寄。1921年秋，当陈学昭进入爱国女学文科学习的时候，她的二哥除了给她付清学费、膳费外，还留下一些钱给她做零用。“二哥给我读了几年书，在这件事情上我永远感激他。”²⁵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传统家庭的资助，她们几乎就无法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学习新知识，更不用说以后在社会中谋求职业，施展各自的才华了。可贵的是她们并没有像社会中的一些女性那样，接受新式教育仅仅是“为了婚姻水准的提高，进学校去求智识，把妇女运动作为出锋头的工具”²⁶，而是要依靠自身的才学，在社会中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她们深知“女子得了职业，然后经济方能独立，经济独立以后，自然可以增高妇人解放的势力。”²⁷。

三

加盟《大公报》，成为这几位知识女性共同的生活经历。吕碧城于1903年担任《大公报》编辑。蒋凌霄于1927年在《大公报》担任外勤记者，后成为副刊《家庭与妇女》的主编，1936年，她到《大公报》上海版工作，长期担任《上海职业妇女访问记》专栏的工作，采访过上海各界著名的女性，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并构成该报、该版的特色之一。陈学昭于1927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担任《大公报》驻欧洲特派记者，直到1931年。杨刚在1939年9月1日到《大公报》香港版工作，主编《文艺》和《学生界》等副刊，后负责《大公报》桂林版《文艺》副刊，1944年3月，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撰写美国通信。彭子冈于1938年1月到《大公报》汉口版开始记者生涯，后到《大公报》重庆版继续从事新闻采访工作，仅1943年她就撰写了近百篇重庆航讯，曾被新闻界同行美称为“重庆百笺”，把大后方的心声和重庆的真相及时而形象地介绍给读者。1945年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记者。

事实证明，包括在《大公报》工作的从业经历，使她们真正成为“能独立，能自谋为生，要锻炼自己的身体逃出了生理上的阻碍，要锻炼自己的思想打破了旧礼教的束缚”²⁸的知识女性、职业女性。在成为知识女性特别是职业女性的同时，她们也面临着是否要以及如何扮演家庭角色的问题，虽然“贤妻良母曾是传统时代中国女性的人生角色，宅院居室则是她们劳动和生活空间的基本范围”²⁹，但是这几位女性对于自己的感情归宿、家庭生活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们根据各自的情况，试作如下类型分析：T

第一种类型：终身未婚。如吕碧城就极力打破传统女性必须“三从”的人生模式，选择了一条独特的生活道路。当她九岁的时候，由父母做主和同乡的汪氏订婚，但后来父亲去世，母亲因为堂叔霸占其家产被掠去并遭到幽闭，家道衰败。这一变故，给吕碧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对她的家庭观也有所影响。因为“家庭经济的窘迫，母亲的勤劳和一切痛苦的事项与儿童的思想有极大的关系。人生真正的愉快和天伦之乐，不独没得享受，而反使她生一种痛恨家庭的观念。”³⁰特别是后来汪家因此而提出退婚要求，给她的心灵造成极大的

创伤。吕碧城“方以才貌噪于时，遽蒙奇耻。”³¹

此后，吕碧城的感情生活也甚为坎坷。当她在天津时，清朝驻日公使胡惟德要纳其为妾，被她拒绝。她也曾与诗人杨云史“诗筒往还，文字因缘，缔来已久”，甚至以“天地悠悠，我将安托”为寄，可惜的是，杨后来却和他人结合，时人不禁唏嘘不已：“沧海百年，心事终成虚话，此真人间无可奈何事。”³²。经历这些曲折之后，使得她对婚姻、家庭自有一番看法：“中国男子不识义字者比比皆是，其于父母所定尚不看重，何况自己所挑？且当挑时，不过彼此皆为色字，过时生厌，自尔不终；若是苟且而成，更是看瞧不起，而自家之害人罪过，又不论也。”³³因此，每当有人和她谈论婚姻之事时，她总是表明这样的态度：“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³⁴这种独身的想法，让她的老师、启蒙思想家严复也深感忧虑，“此儿不嫁，恐不寿也。”³⁵其实，并不是她不愿选择婚姻，只是“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³⁶机缘不合，使得她不得不延续着独身生活。

在社会上，她是一位引人注目的奇女子。1903年，当她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聘为该报第一位女编辑之后，便借《大公报》在社会中的影响，提出并宣传自己有关女子教育的主张，把新式教育的兴建看成是改造女子国民素质，培养女子与男子竞争能力的有利武器，认定要以欧美为榜样，而不应该取法古代，仅仅局限于家政和识字等狭小的范围。她不满于把女子仅仅培养成读书识字、能写会算、精于家政的贤妻良母。她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同样是国家的主人，应该接受全面的知识训练。后来，她一度担任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辞职后，游历欧洲诸国，最后，终老于香港。尽管她个人的婚姻、家庭之路不同于常人，但在社会上确实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典范。

第二种类型：虽然自主地选择了婚姻对象，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和牺牲，但是却并没有获得长久的幸福，最终以分离而结束家庭生活。分离后，她们都没有再组成家庭，而是保持独身的生活。如陈学昭、杨刚等人。她们“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思潮下，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学生，自不肯再接受家长‘包办婚姻’”。

陈学昭留学法国时，过着半工半读的清贫生活，以为《大公报》撰写通讯维持生活，家人为了逼她结婚，扣押她在《大公报》的稿费。但是，她并没有屈服。坚信“自由恋爱结婚必须男女都有处世阅历和选择的眼光，才不致被感情所欺骗蒙蔽，自尝苦果。”³⁷后来在法国，她认识了自己的丈夫，一位学医的留学生，由于同情而与之结合。1935年2月，她带着两岁的儿子，同丈夫一起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当他们回国后，陈学昭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放弃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力，丈夫去哪里，她就跟去哪里。尽管他们曾共同决定一家人奔赴延安，可是当她的丈夫觉得自己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不如妻子的时候，心中不快，加上在所服务的医院中工作开展得不太顺利，所以非要离开延安，陈学昭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追求，立刻把行李收拾起来，离开他们历尽艰辛才到达的革命圣地，辗转回到重庆。后来，她的丈夫又要去延安担任医院院长，于是，她又跟着来到了延安。尽管如此，为了孩子她宁愿维持这段并不幸福、快乐的婚姻。但是最后由于夫妻感情愈来愈坏，以至完全破裂，两个人终于选择了离婚。对此，她“并不遗憾，只是感到自己太软弱，不识人，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³⁸。婚姻的不幸，并没有影响到她的事业，在从重庆到延安的途中，她还在为《大公报》的姊妹机构国闻通讯社撰写陕北通讯。从此之后，她就一直带着女儿过着独身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封建这东西还是习惯地深深地埋藏在我的行动和思想里。”³⁹

而杨刚虽然说传统观念似乎并没有陈学昭那样强，而且她和丈夫郑侃相识于为革命事业奋斗的过程中，但是家庭生活却维持得也并不很长久。1928年，当杨刚入党时，郑侃是她的介绍人。婚后，矛盾逐渐暴露。杨刚渴望投身于热烈的革命中去，而郑侃则希望过平静的生活，两个人聚少离多，最后因为志向不同而分居。直到郑侃被日本侵略军炸死，两个人

也没有在一起，但两个人一直都是朋友。如果说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话，显然，杨刚是选择了新闻事业，而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可能这种选择是出于无奈。而她为《大公报》所做出的贡献却是有目共睹的。1939年她在香港《大公报》工作时，她就表示要让自己负责的《文艺》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冑”，为祖国抗战宣传服务。1942年6月，她来到桂林，继续编辑《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同年7月，她作为《大公报》的特派记者到东南前线进行战地采访，从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发回通信10多篇。她的通信反映了广大民众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痛苦生活，以及强烈的抗日要求，宣扬了中国必胜的理念。她的这些通信不仅后来被汇集到由桂林文苑出版社出版的通讯集《东南行》中，而且也为她赢得声誉，受到包括总编辑王芸生在内的众多同人的褒奖。1944年在美国期间，她撰写了40多篇美国通信，在重庆和上海等地的报刊上以专栏的形式发表，有的实际上是文学佳品。这些通信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比较详细而透彻地分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向，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层次的一些问题，揭示了美国民众的社会生活实况以及淳朴率真的品行。

第三种类型：美好的爱情经过时间的检验，最终获得了幸福而完满的结果。如彭子冈。中学时代的彭子冈由于才华出众，得到后来成为其丈夫的徐盈的关注，因为同为《中学生》杂志的热心读者，所以开始通信并逐渐产生了真挚的感情。为了避免被家人所阻挠，每次当徐盈给彭子冈写信的时候，总是由彭子冈的弟弟先把信收起来，等彭子冈回来之后再转给她。他们“鄙弃那无聊的一个劲儿缠绵的恋爱”，更“诅咒小姐哥儿们的迷在优越的享受中的买卖式的恋爱”，⁴⁰认为那是病态的情，畸形的爱。他们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共同探讨人生，剖析社会。1936年秋，任职于《妇女生活》的彭子冈和当时任《大公报》外勤记者的徐盈因为要去外地采访，遂在上海开明书店的一间小房子里，在没有请一个客人的情况下就匆忙结婚了，然后一起前往江西、安徽等地采访，写出了一系列精彩的通讯。采访归来，他们才按照传统方式补办了婚礼。后来，彭子冈也做了《大公报》的新闻记者，从此两人被人们称为《大公报》的“双子星座”。

在《大公报》，彭子冈的新闻成就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丈夫。她以文笔尖锐、泼辣著称。《大公报》汉口版在《最近来汉的四位女作家缩写》中，称赞她善于写调查和访问的文字，是一名很好的女记者。当徐盈要调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时，她毅然离开重庆，随丈夫到了北京，并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可以说，她在尽力兼顾家庭、事业两方面。她曾单独闯到军调部美方人员那里，乘机去新解放的张家口采访，写出《张家口漫步》，1946年2月，她还随军调部派出的调处小组前往山东兖州，以亲见、亲闻的事情，揭示出蒋介石挑起军事冲突和争端，加剧内战危机的内幕，写成《济南小组在兖州》。可见，即使为了家庭的完整，她要放弃一些事业上的追求，但是，依然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在照顾好自己家庭之同时，彭子冈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弟弟。1937年秋，得知苏州遭受敌机大轰炸的消息后，一向不写诗的她，一口气写下了百行长诗，倾诉对父母的忧虑。彭子冈还鼓动弟弟投奔延安并亲自把弟弟送到中共办事处，使他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名共产党人。1946年冬，当姐弟短暂相聚重又分离后，彭子冈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公开发表了记实体小说《惆怅》，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姐弟的思念之情。

这几位《大公报》女编辑、记者在家庭中不仅是妻子，而且还是母亲，在动荡的社会中如何给孩子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环境是她们必须认真考虑的大问题。“结婚离婚，虽然可以取最简单最自由的方法；而对于儿童的养育，则不可不完全是的责任。”⁴¹同时，也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因为那是她们不依靠别人、独立于社会的资本。这样，“每人都需要担负起她们自身在社会上的职业地位，和家庭中母性专差的两重担子”⁴²，她们都曾面对两难的困境：是“做妻”、“做母”还是“做人”？⁴³加之她们所选择的新闻记者职业也比较特殊，既辛苦又需要四处奔波。为了维护家庭的安定，保证孩子们的顺利成长，她们付出了很

多的代价，尤其在战乱的时代。

在重庆为《大公报》工作时，彭子冈刚刚成为母亲。每次敌机轰炸的警报响起时，她就得抱着孩子，提着奶瓶、热水壶和尿布，到居所下面的防空山洞中去躲避，“在黑黑的洞内听够了“轰轰”的炸弹声，还不知回去后水电停了没有。”⁴⁴摘下了著名女编辑、记者的光环，在家中彭子冈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也要关心柴米油盐和孩子的喜怒哀乐。

和陈学昭、杨刚比较起来，彭子冈还算是幸福的。因为陈学昭、杨刚无法一边工作，一边自己带孩子，所以只好把孩子寄养给别人或者是保育院。尤其是杨刚的女儿，除了幼年时代，几乎很少和自己的母亲在一起生活。在女儿出生之后不久，杨刚便与丈夫分开了，因为要离开北平，有一段时间只好将孩子托付给杨刚在燕京大学的老师包贵思，后来她自己还曾带着女儿东奔西跑。杨刚的女儿郑光迪回忆说：“那时她带着我东转西转，我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或武汉，或香港，长则几个月，短则几个礼拜，真有如现在常用的一句话：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新到一处，她总是忙着。”⁴⁵后来，这种颠沛流离的职业生涯，使杨刚实在无法照顾好自己女儿，于是不得不把女儿寄养在亲戚家。可以说，为了事业，她把亲情都舍弃了。杨刚曾非常痛心地说道：“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⁴⁶，象是一种自责。但是，杨刚对女儿的爱确实是真摯的。当她看到女儿站在高处时，总不免“大吃一惊；然后细声劝我以后千万不能再这样。”⁴⁷

四

综上所述，我们从《大公报》这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的生活经历中可以看出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知识女性如何走出家庭，步入社会，开始新闻记者、编辑生涯，独身或者通过自由恋爱，建立小家庭，扮演起家庭角色的生命轨迹。其特点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她们都生活在多子女的传统大家庭中，而这种家庭所给予她们的，既有性别歧视和不公平的一面，引起她们本能的反抗，又为她们的成长提供了一定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在保守而传统的家庭环境中，由于接受了一定的知识与文化，她们对新知识、新思想更容易产生探寻的要求，从而促使她们摆脱传统大家庭的束缚，接受新式教育。然而在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她们仍然无法完全脱离传统大家庭，尤其是来自家人的金钱资助。

第三，社会的急剧动荡，给她们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而她们通过职业的选择成为了生活的强者，为女性争得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帝国主义依然继续不断的对中国实施军事和经济侵略、境内军阀混战不已与连年灾荒、匪患，使人民常生活在逃兵、逃荒、逃匪之中，这对于农村凋敝和旧家族制度的崩溃，更发生推波助澜的作用。”⁴⁸在动荡的岁月中，她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获得一份职业才能真正地在社会上立足，进而提高女性的社会政治地位。“一个妇女，在政治上争取地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争取职业上地位也同样应该看重。……在职业上的地位提高同时也会促进了政治上的地位。”⁴⁹

第四，一般而言，婚姻自由和自主成为这一代知识女性独立的重要标志。有些知识女性由于“看到自由恋爱婚姻前途的暗淡与悲愁，在旧礼教下的牺牲，”⁵⁰因此抱定独身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建立小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在这样枯寂的社会里，足以安慰我们的，只有美满的家庭，”⁵¹因此，不懈地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家庭的幸福和婚姻的美满。然而在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中，她们更多地是选择了事业，能够维持美满家庭生活者虽然存在，但失败者也不乏其人。当然，其原因并非单方面的。社会的急剧动荡不安，使人们的家庭生活与感情世界都面临更多的危机和考验。为了克服这种种危机，勇敢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强者才是最后的胜者。

可贵的是，由于这些知识女性普遍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因此在是否选择婚配，以及

如何选择对象、缔结婚姻、安排家庭生活，乃至解决夫妻矛盾，结束婚姻关系的过程中，她们都要表达自己的意志。而当自己选定的婚姻不幸福，以失败而告终后，她们一般都不会再结婚，而是选择独自生活的方式。可在单独抚养孩子的时候，又很难给孩子们一个比较稳定的、适合孩子们生长的环境，只好采取寄养的方式。

在《大公报》的百年发展过程中，工作期间的知识女性还有很多。她们对于事业与家庭的态度如何？在家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样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希望以后有机会对更多的知识女性的更多层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Female Intellectuals' Family Roles in Modern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Case of Editresses and Newswomen at Da Gong Bao

Hou Jie, Qin Fa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Based on studying the cases of the well-known editresses and newswomen at *Da Gong Bao* (Da Gong Dail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women went out of traditional family to have new education and entering society as professional women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Their social missions and family roles are examined on the real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marriages and families so that their family roles can be classified.

Keywords: Modern Social; Family Roles; Da Gong Bao; Female

收稿日期: 2003-10-31

作者简介: 侯杰, 男,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秦方, 女,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¹ 吕碧城 (1883-1943) 出生在山西太原, 曾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女子学堂。蒋凌霄 (生卒年不详) 出生在江南小镇陈墅, 曾在济阳女子高等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南开大学等学校就读。陈学昭 (1906-1991) 出生在浙江海宁, 曾在海宁县立女子高等小学、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上海爱国女校求学, 后到法国留学。杨刚 (1905-1957) 出生在江西萍乡, 曾在南昌葆灵女子学校、燕京大学就读, 后到美国留学。彭子冈 (1914-1988) 出生于北京, 后迁居苏州故里, 曾就读于中国大学英语系。

² 吕碧城的父亲吕凤歧, 进士出身, 累官至山西学政。有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 同母姐妹三人。蒋凌霄的父亲是读书人, 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 蒋本人是家中幼女。陈学昭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当地县立第一小学校长, 上有四兄, 父早逝。杨刚的父亲曾任武昌守备, 后又做过江西道台、湖北省财政厅、政务厅厅长, 杨有三个哥哥, 三个姐姐。彭子冈的父亲出身苏州彭氏大族, 前清时考中秀才。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东京, 专攻博物学 (即生物学), 学成回北京, 在高等院校中任教授。彭有一姐一弟。

³ 陈学昭著:《我的母亲》, 邓九平主编:《寸草心》, 同心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246 页。

⁴ 仲芬著:《告小家庭的主妇: 工作与娱乐勿因袭大家庭之弊害》, 上海《民国日报》1931 年 2 月 2 日。

⁵ 陈学昭著:《我怎样开始写作》, 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7 页。

⁶ 侯杰、范丽珠著:《中国民众意识》,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0 页。

⁷ 天然著:《女子是个人——读傀儡家庭后》,《大公报》1929 年 10 月 3 日。

⁸ 陈学昭著:《天涯归客》,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 3 页。

⁹ 陈学昭著:《我早期的读书与写作》, 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305 页。

¹⁰ 杨刚著:《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自传》, 萧乾编:《杨刚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516 页。

¹¹ 蒋凌霄著:《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 56 续,《大公报》1930 年 11 月 10 日。

¹² 黄伟经著:《活着, 为人民而写》, 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第 28 页。

¹³ 蒋凌霄著:《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 56 续,《大公报》1930 年 11 月 10 日。

-
- ¹⁴ 陈学昭著:《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 ¹⁵ 李保民著:《吕碧城年谱》,《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6页。
- ¹⁶ 陈学昭著:《我早期的读书与写作》,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 ¹⁷ 阎纯德著:《杨刚》<http://www.nbip.com.cn/books/jzwx/zgxrwcj/20/012.htm>。
- ¹⁸ 蒋凌霄著:《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56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0日。
- ¹⁹ 吕碧城著:《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 ²⁰ 吕碧城著:《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 ²¹ 李保民著:《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 ²² 李保民著:《吕碧城词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页。
- ²³ 吕碧城著:《兴女学议》,《大公报》1906年2月20日。
- ²⁴ 蒋凌霄著:《本报记者的自叙记》,《津市职业的妇女生活》第57续,《大公报》1930年11月11日。
- ²⁵ 陈学昭著:《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 ²⁶ 励华著:《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
- ²⁷ 汤鹤逸著:《妇人问题》,《晨报》1926年3月30日。
- ²⁸ 懿行著:《一篇演说——理想中的女性》,《大公报》1930年12月24日。
- ²⁹ 罗苏文著:《清末上海都市女装的演变(1880-1910)——以〈点石斋画报〉、〈图画日报〉为例》,第3页。(未刊本)
- ³⁰ C. T. YIN著:《我对于“独身”的见解》,《大公报》1928年3月22日。
- ³¹ 刘绍唐著:《民国人物小传·吕碧城传》,《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104页。
- ³² 云若著:《隔一重洋各自愁》,《北洋画报》第243期。
- ³³ 王棫编:《严复集·与甥女何纫兰书》,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39页。
- ³⁴ 郑逸梅著:《郑逸梅选集》第三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 ³⁵ 王棫编:《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93页。
- ³⁶ 吕碧城著:《予之宗教观》,刘纳著:《吕碧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 ³⁷ 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18页。(未刊本)
- ³⁸ 李杨著:《陈学昭》,<http://www.nbip.com.cn/books/jzwx/zgxrwcj/20/013.htm>
- ³⁹ 陈学昭著:《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 ⁴⁰ 《新闻界人物》编辑委员会编:《新闻界人物》十,新华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
- ⁴¹ Y. D著:《古本忒氏的婚姻问题观》,转引自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6页。(未刊本)
- ⁴² 虹弗著:《关于女性应有的常识》,《大公报》1933年10月29日。
- ⁴³ 为易卜生编剧的《傀儡家庭》中女主角娜拉对自己角色的思考。“做人”是指能否通过自己的职业获得独立的人格。
- ⁴⁴ 彭子冈著:《熙修和我》,《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38页。
- ⁴⁵ 郑光迪著:《怀念我的妈妈》,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1页。
- ⁴⁶ 杨刚著:《〈桓秀外传〉·代序》,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9页。
- ⁴⁷ 郑光迪著:《怀念我的妈妈》,萧乾编:《杨刚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2页。
- ⁴⁸ 梁惠锦著:《妇女与婚姻自由权(1920-1930)》,第3-4页。(未刊本)
- ⁴⁹ 全衡著:《访问陈学昭先生》,丁茂远编:《陈学昭研究专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 ⁵⁰ 励华著:《一封公开的信——写给婚姻苦闷的青年妇女们》,《大公报》1934年3月25日。
- ⁵¹ 蒋凌霄著:《我们的旨趣》,《大公报》1927年2月11日。